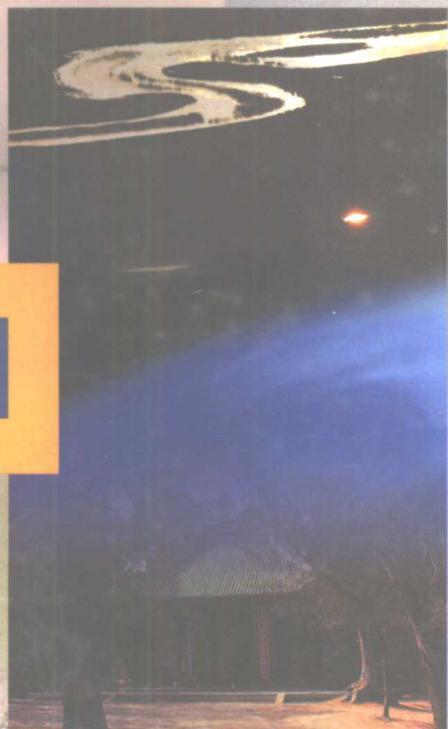


从黄帝到崇祯

二十四史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徐梓 著
周一良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从黃帝到崇禎

二十四史

徐梓 著
周一良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从黄帝到崇祯·二十四史
徐梓 著 周一良 审定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插页 2 张 105,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1·1504·4/G·530
定价：7.85 元（软精）
2.85 元（平）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羡林
一、《二十四史》的形成	1
二、《二十四史》的体例	9
三、《二十四史》各史简介	19
《史记》	19
《汉书》	26
《后汉书》	33
《三国志》	40
《晋书》	47
《宋书》	51
《南齐书》	56
《梁书》、《陈书》	58
《魏书》	62
《北齐书》	68
《周书》	70
《隋书》	73
《南史》、《北史》	76
《旧唐书》	81

《新唐书》	86
《旧五代史》	91
《新五代史》	95
《宋史》、《辽史》、《金史》.....	101
《元 史》.....	113
《明 史》.....	119
四、《二十四史》的意义与价值	127
五、《二十四史》的版本	135
后记.....	李生泉 147

一、《二十四史》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旧王朝更代之后，新的政权一建立，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往往首先要考虑做以下两件事：一是颁布历法。它的意义除了是借天意来恢复人间现世的秩序之外，还在于国人接受了新的历法，就意味着接受了对新王朝的忠诚。二是组织人力编写前一朝的历史，记载一代君臣政事的贤否得失。除了供后人借鉴和吸取知识之外，它的政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君观史，宰相监修”，就是要通过论证前朝灭亡的必然性，来为新政权提供合理和合法的依据。所以，这两件事其实有着一致的指向，如果说编写历史是宣布一个王朝已经灭亡的话，那么，颁布历法则昭示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由官方组织修纂的一套史书。其中一些虽然出自一人之手，但也是得到官方承认的。有些是事前得到官方的允许，或直接是奉皇帝之命而撰修，有些则是事后由皇帝“钦定”的。正因为如此，《二十四史》又称为正史。

《二十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

《明史》二十四部史书。这套史书的修纂不成于一时，更不是出自一手，整个修纂过程从《史记》写成的汉武帝时代，到《明史》编定的清乾隆之初，长达一千八百多年。《二十四史》的名称，也是与时俱进、由少到多、逐渐形成的。

三史

这套史书的集合，最早是“三史”。据《三国志》记载，吴王孙权曾对他的将军吕蒙说：我“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①他还告诫吕蒙要抓紧读一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和“三史”。吴国的留赞，也喜好读兵书及“三史”，每当读到古代优秀将领为攻战所设的阵势，就对着史书感叹。《隋书·经籍志》在《史汉要集》和《史记正传》之间，还著录有吴太子太傅张温所撰的《三史略》二十九卷。可见三国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三史”的名称，并已十分普遍。这时，范晔尚未出生，《后汉书》还没有面世，“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所撰的《东观汉纪》。

四史

“前四史”的说法现今非常普遍，所指除了“三史”之外，再就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这四部史书，都是私人撰修的，没有官修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再加上历久成书，千锤百炼，无论是史笔还是文笔，都堪称一流，在《二十四史》中，最为世人所称赏。四部史书的集合为一，这应当是最重要的着眼点。

^①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十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的名称，有的学者著有《十史事语》、《十史事类》及《十史类要》。所谓“十史”，指的是记载三国、晋、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十个王朝的十部史书。与“十史”的内容大致相同，在历史学家们中还有“八书二史”的说法，“八书”指的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以及《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二史”指的则是《南史》和《北史》。此外，在南宋初年，井度将记载南北朝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七部史书合并，在蜀眉山刊行，这是正史的最早辑印，人们称之为“眉山《七史》”。

十三史

至少在宋代，曾有过“十三代史”或“十三史”之说。《宋史·艺文志》就著录有吴武陵的《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宗諫注的《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的《十三代史目》一卷，以及佚名的《十三代史选》五十卷。至于“十三史”所指，则有不同说法。

十七史

“十七史”之称也颇为著名，最著名的是文天祥回答元代丞相李罗的那句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一些以“十七史”为题的著作，如宋代王令的《十七史蒙求》、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现在依然流传很广。此外，《宋史·艺文志》还著录有周护的《十七史赞》以及佚名的《名贤十七史确论》。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翠川毛氏汲古阁还辑印有《十七史》。可见由宋至清，“十七史”的说法一直存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也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十七史”。

十八史

“十八史”的说法较少见。元人曾先之有《十八史略》二卷。它指的是“十三史”以及修成于宋代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和元代官修的《宋史》、《辽史》、《金史》。由于宋、辽、金三史修成在元顺帝至正年间，时已当元朝末年，并且距《元史》成书为时不远，所以“十八史”的说法流传不广。

十九史

朱明王朝建立不到三年，《元史》便仓促成书，加上原有的“十八史”，便构成了“十九史”。在明朝前期才有十九史这一名称。如安都有一百七十卷的《十九史节定》，梁孟寅有《十九史略》。

二十一史

“二十一史”在明朝流传较广。嘉靖时期，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人奏请校刻正史，起初打算派人到各地访求好的版本，因“部议恐滋烦扰”，嘉靖皇帝便命令辑印了《二十一史》。万历时，北京国子监也开雕翻刻，在万历二十四至三十四年十年中刊成。这样，“二十一史”的名称便一直传至清初。

二十二史

清乾隆四年，《明史》成书后，乾隆皇帝诏令刊行“二十二史”，就是“二十一史”加上《明史》。“二十二史”的名称，由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两部名著的影响，知名度之高，仅次于“二十四史”，而《廿二史札记》实际上兼包

了“二十四史”。

二十三史

乾隆皇帝在诏令刊印“二十二史”后不久，考虑到新旧两《唐书》实在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又诏令将《旧唐书》也定于正史之中，使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这样便形成了“二十三史”。对于乾隆皇帝此举，《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曾吹捧为“千古至公之道”。

二十四史

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邵晋涵等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五代史》，并于乾隆四十年编成缮写进呈，乾隆皇帝命令将它刊进正史之中，这样便形成了我们要说的“二十四史”。

然而，这套史书的增益并没有就此而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史书加入，“二十四史”又演变成了“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二十五史

对于明初仓促修成、纰漏百出的《元史》，后世学者颇多诟病，并一度竞相考订重修。清末民初的史学家、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柯劭忞，对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广收慎用，博采约取，集各家之大成，穷三十年之力，于一九二〇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撰工作。第二年，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明令将它列入正史，这样，国家正式承认的“二十四史”成了“二十五史”。几年后，当时的历史学家们组成

了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除了辑印《二十五史》之外，还辑印了《二十五史补编》，将当时所能得到的有关二十五部史书的拾补、校正、考订、疏证之作，收罗殆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套系统有用的资料。

二十六史

《清史稿》虽然是一部没有最后订稿的著作，也没有被当时的政府所承认，更不在“二十四史”的范围之内，但人们论列“二十四史”或正史，都往往要涉及到它。这是因为，它也是按历代修纂正史的方法写成的，史馆设置、人员配备、材料收集、编纂程序等都与以往无异。只是编写人员一时难以定稿，又因为过于慎重，才命名为“稿”。再加上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遗臣”，其中渗透有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和鼓励复辟的思想，才为当时的政府所禁行。但近六十年来，学者们还是力图把它和那道历史的长城连接在一起。比如中华书局在组织人力点校“二十四史”的同时，虽然遗弃了明令列在正史中的《新元史》，却没有冷落这部尚不具有正式正史资格的史书。“二十六史”的名称可以说呼之欲出吧。

二十四史与正史

有必要进一步辨析一下“二十四史”和正史的关系。因为在历史上，正史的内涵所指，是不断变化的，因时因人而不同，不能完全与“二十四史”等同。

正史的名称，最早见于梁人阮孝绪《七录》。他将当时所有的典籍分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和仙道录七类。其中纪传录之下，又分有十二类，是史部划分